

# 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思维 局限性及改进策略

徐 永

(江西蓝天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

**摘 要:**“模式论”的泛化给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弊端。由于受限于研究者的诸多主体因素,研究中的“伪求异思维”非常盛行,这使得研究者对民办高等教育特质的强调变成了一种无所指涉的“宏大叙事”。面对这种现状,如何从“常识式的学术表达”中解放出来,习得“底层叙事”的意愿和能力,是合理考量民办高等教育的关键,也是提升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民办高等教育;教育模式;模式论;主体特征;伪求异思维;底层叙事

**中图分类号:**G649.21;G5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1)06-0009-04

从整个教育研究界的研究情况来看,与其他形式的教育研究相比,民办高等教育研究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在现实的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中,研究者常常用诸如“模式”、“框架”、“类型”等词汇标示民办高等教育乃至民办高等教育研究自身的“特质”。只要我们略微做一些考察,做一下简单的文献梳理,就会发现这种“伪求异思维”<sup>①</sup>下的文章与课题不在少数。譬如,不少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的学人喜好用“民办高校的德育模式”、“民办高校的教学模式”、“民办高校的治学理念”等提法,而真正涉及到的问题,无论从其理论层面还是从其实践层面上来讲,与其他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教育学术研究,并无太大区别。本文将从新的视角探讨民办高校教育模式问题。

## 一、民办高等教育模式论的理论假设

从理论上来看,当一个研究被命名为“民办高等教育的某种模式”时,也就意味着其理论假设至少是基于以下几点:首先,与公办高等教育对比,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有自身的组织行为模式,这一模式下的民办高等教育同公办高等教育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其次,民办高教内部的特殊性(如甲学院与乙学院的差别可看作是民办高等教育内部的特殊

性)已经上升为整体的普遍性,可以进行类型上的探讨了;再次,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这种教育实践经由研究者的逻辑加工,已经理论化,可以用模式和框架详加诠释了。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对于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有没有自己的组织行为模式这一点就很难说清楚。在当下有关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组织行为模式的研究中,多数研究停留在公办、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组织形式的差异之上,至于其组织行为本身,研究者关注甚少。而问题就出在这个层面上。事实上,同一类型的组织,其组织形式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组织行为的明显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法人属性、董事会制、招生制等方面与公办院校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就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有了自己的组织行为模式。实际上,民办高教自身究竟有无组织行为的特质,需要先进行相应个案研究。只有结合特定的社会脉络和教育情境,从“底层叙事”的角度予以深描和刻画,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类化和比较,从而作出恰当的判断。在此,之所以要强调既定的社会脉络和教育情境,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和不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总是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体”。<sup>[1]</sup>在民办高教研究中能有此等眼光的研究,目前来看

作者简介:徐永(1983-),男,山东临沂人,江西蓝天学院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大学组织与文化、教育叙事、教育与社会等研究。

实属罕见。对于第二点来说,恰恰是因为研究者的研究悬浮于旁人“假定的社会事实”的层面之上,无法深入到组织内部以体察其中的差别,所以,其研究的内容只能止步于“民办高等教育是不同于公办高等教育”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层面上(实际上,二者的异同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第三点而言,由于研究者没有在前面两个层面上做深入研究,所谓的“民办高等教育的模式”的理论语境多少是部分研究者“为课题而课题、为论文而论文”所刻意追求的。

## 二、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主体特征及思维模式

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缺乏“底层叙事”经验,又不愿意深入到文化层面上去探讨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文化属性,“伪求异思维”的结果常常会以“英雄所见略同”这一尴尬的状况收场。这表现在,民办高教研究中教科书式的话语盛行,研究者时常会有意无意地模糊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与民办高校工作经验总结的界限。这一现象在整个高等教育研究的早期(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大量出现过,但时至今日,在整个教育研究界学术自省意识已经比较强烈的境遇下,民办高教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依然比较盛行,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造成这一研究现象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功利化“伪求异思维”,还在于民办高教研究的主体特征。民办高教研究队伍大体有以下几部分人员组成:专门教研机构和公办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民办高校的管理者、民办高校的教师、民办高校的专职研究人员。就目前的文献梳理来看,民办高教研究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那些身在公办院校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手里,一些高等教育学术界的前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办高教研究的理论话语乃至民办高校的实践逻辑。譬如,现在民办高校以“应用型为基准”的办学定位,就是非常典型的对权威专家话语进行深度渲染的结果。固然,他们在理论化的高教研究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愿意涉足民办高教研究,但问题在于,不论是求学、工作,还是生长、栖身于公办高校的这部分学人,如何运用自己的学科之眼去关注民办高等教育。由于绝大多数研究者缺乏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式考察,使民办高教研究常常带有浓重的假想色彩。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就是,当涉及民办高校办学模式的理论话语时,将其这一模式的存在置于“默认的事实”的位置,并没有体察到民办、公办高校组织文化的“趋同现象”,更谈不上去探讨和分析中国民办高校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政治逻辑(抑或是不愿言说)。在消费主义日益

盛行的今天,非但一般的公办高校抛弃了“象牙塔”的传统,就是那些热衷于争创世界一流的重点大学也时时把就业率这样功利化的语词挂在嘴边。更何况,公办高校中为数不少的技术学院、专科学校和大批的高职高专都在致力于营造一种“与社会无边界”的“应用型教育模式”的舆论和实践氛围。另一种常见的假想逻辑则是,相比公办高校来说,民办高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自治权,更容易发挥办学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开创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实际上,民办高校的自主权远非想像的那样大。

与这部分“身在其外”的高教研究者不同,民办高校的管理者则在实践层面上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既受限于“管理者的身份意识”,更受限于“局内人的眼界”。许多人自身缺乏相应的理论功底,所做的研究很难从“一般常识”上升到理论高度。因而,其中的绝大多数研究属于工作经验总结性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即便民办高校的管理者有研究的诉求与理论的自觉,基于作为管理者的利害关系,也基于学术道德方面的考虑,那些大量的一手资料也很难成为研究的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名民办高校的管理者”,从学术的角度去考量民办高校的行为逻辑和文化特征,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也正是这个缘由,我们去看那些期刊文章甚至专著的时候,难以从中探寻出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性。

相比“公办高校的高教研究者”,民办高校的教师们拥有较为直观的教育经验和教育实践,手头也掌握了一些研究素材,但通过文献梳理和深入到相应的科研管理中考察,我们发现,作为民办高校普通研究者的教师,普遍存在着研究功利性过强的问题。这表现在,不少教师为评职称,存在着申请课题可以横跨几大学科领域、发表文章也能“天马行空”的现象,至于研究的内容则停留在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初级阶段。许多已经被反复论证过的高等教育学的相关命题,依然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当然,问题不仅仅限于功利性的研究目的,还在于民办高校的学科结构中涉及一级学科教育学的专业很少,大多数民办高校并无教育系(少部分院校有学前教育系,但涉及的方面与民办高等教育自身的研究相差悬殊),因而也缺乏相应的师资队伍。这使得“作为民办高校普通教师”的研究者们缺乏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受限于自己狭隘的学科范畴,难以生发出真正的问题意识。

比之于前面几种“研究身份”,民办高校从事民办高教研究的专职研究人员无疑拥有各种研究便利。不少民办高校也成立了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室、

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所、甚至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院之类的专门机构。相比“公办高校的教育研究者”，供职于民办高教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着作为“局内人”的身份优势，与“民办高校的管理者”相比，他们也较少存在研究的种种顾虑，与一般老师相比，不少专职研究者则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然而，纵观当前民办高教研究的现状，民办高校高教室、高教所的成立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究其缘由，有作为整体的教育学学术性较低的大背景，也有民办高校高教研究机构自身的缘由。一是组成人员学历层次较低，以硕士和兼职研究员为主；二是这些机构本身一般还承担着一定的教学管理任务，从事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的管理工作，其本身的定位不是科研机构，而是“教学辅助部门”；三是民办高校管理人员不够重视，缺乏研究自身的意愿，一些管理者存在着“真正的研究”等同于暴露问题、“揭伤疤”的心理。

正因为这些研究的主体特征，民办高教研究中的“伪求异思维”非常盛行。“伪求异思维”盛行的典型例证就是研究者对相关研究“去情境化策略”的运用。本文所指的“去情境化策略”表现在：在微观层面上，没有前文所指涉的“底层叙事的意愿与能力”，一些研究虽冠之以某某学院的个案研究，但却是以一种“过度符号化的教科书式话语”呈现出来的。这样的结果导致同样的内容似乎可以适用于任意一所高校，丧失了个案研究的独特性。在宏观层面上，研究者很难跳出民办高等教育话语的内部境遇。即便在学术表达中，加上了诸如“金融危机”、“国家中长期发展纲要”等时髦词汇，但由于研究者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缺乏本土省思，想要作出深入思考也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由此，“去情境化策略”的运用，使得表面上看来处处标榜“民办高等教育模式”的研究，变成了无所指涉的“宏大叙事”。“无所指涉的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难以从学术的任何层面上去考量，也无助于发现那些蕴藏在学校运作肌体中的脉理特征和微观环境，这对于民办高教研究及民办高校自身来说都是弊大于利的。

### 三、民办高教研究的学术性诉求

无论如何，面对当下“伪求异思维”下的民办高教研究，对其学术旨趣的诉求都是非常之必要的。而想要在民办高教研究中真正获得学术启迪，提升民办高教研究的学术水平，推进教育学知识的进步和民办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在相关研究中如何恰当地运用“真正的求异思维”值得我们重视。根据美

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Guilford, 1959)的理解，所谓求异思维(divergent think, 又译作发散思维)，指涉的是思维活动中“惯于扩大观察范围，尝试从多种可能中选取最佳答案的思维倾向”。<sup>[2]</sup>这种思维倾向具有变通性、流畅性、独特性等特点，强调求异与创新。由于“求同思维是求异思维的基础”，具体到民办高等教育研究自身，恰当地运用求异思维的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到“求同思维”的必要性和不足。“求同思维”具有归纳的心理倾向，善于发现不同事物的普适性，这对于民办高教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下的研究中，由于研究者们囿于“伪求异思维”下的理论场域中，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在意识形态、组织文化、教育逻辑上的内在同构性常常被研究者忽视或作为不言自明的事物加以对待。事实上，能否用“求同思维”在民办、公办的形式差异背景下发现二者与“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传统”的强关联度，是恰当地理解和诠释民办高校何以如此、民办高教如何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是在实际的研究中，“求同思维”非常容易走入误区。目前，民办高教研究中的一大误区就是研究者们往往会忽视教育发展背后的社会脉络和政治、文化情境，简单把比较教育研究的一般观念照搬到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如欧美诸国的私立大学如何，中华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如何，我们的民办高等教育也可以如何，等等，这种简单类比是不可取的。

“求同思维”为我们研究民办高等教育提升了一个高度，使得研究者可以跳出公办、民办简单二分的思维模式，跳出高等教育自身的范畴，将这样一种教育形态放在社会的大情境中去考察，从而习得一种开放的、历史的、有厚度和深度的学术眼光。但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不能止步于此。民办高教研究中的“求异思维”则要求研究者不妨尝试一下多样化的路径，于细微之处探求发掘学问的路径。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由于研究者“去情境化策略的不恰当运用”，一方面相关研究没有学术意蕴，缺乏理论高度，另一方面则是研究者没有作为“局外人”的研究意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此，研究者不仅要加强理论学习，还要尝试运用“底层叙事”的方法来彰显微观层面各要素的互动以及微观见诸于宏观、宏观见诸于微观的过程。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倡教育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路径，如扎根理论、常人方法学、符号互动论等质化研究方法，以此来平抑教育研究中单一的“工作经验总结式研究”和“问卷调查式研究”给学术造成的伤害。基于此，就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性普遍较低的现状而言，更应该尝试运用多样化的研究路

径,探讨那些具有内在价值的问题。

实际上,不论是求同思维,还是求异思维,民办高教研究中(当然,不限于民办高教研究)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那些林林总总的“民办高等教育常识”。关于“常识”的学术意义,迪尔凯姆曾清晰地指出:“我们还太习惯于按照常识的指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很难将常识与社会学(这里似乎也可换成教育学)的讨论彻底分开。甚至当我们自以为摆脱了它的影响时,它也会趁我们没有防备而把它的决定强加于我们。”<sup>[3]</sup>他还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希望读者永远铭记,最常用的思维方式可能最有碍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所以大家应当警惕第一印象的影响。”<sup>[4]</sup>在迪尔凯姆的理论语境中,“常识的形象”无疑是值得警惕的,而他的真知灼见也预言了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教育研究者周围的“常识的魅影”。只是迪尔凯姆的时代已经结束,曾经的“常识观”也要从“科学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披上新时代的面纱了。面对这种学术背景,当下的教育研究者尤其是研究民办高等教育的学人,绝大多数仍然停留在“教育常识”的层面上,这是不能不加以反思的。从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看,如今的“常识”已经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对待了。“常识”自有其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等现代学术的意义。譬如,人类学家可以研究“常识的族群特征”,心理学家可以研究“常识的隐喻色彩”,等等。对于教育学来说,“常识”同样具有它的学术意义。譬如,时下流行的教育叙事研究,其研究对象便是教育境遇下那些看似“常识”的事物。这里要说明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常识”和“常识式的学术表达”不是一个概念,当前民办高教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惯常于进行“常识式的学术表达”,而没有将“常识”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自觉,这是导致相关研究学术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

#### 四、结语

当下民办高教研究的理论构建,习惯于从一些假想的、宏大的、去脉络化的叙述模式中进行。由于民办高等教育理论自身的概念体系、逻辑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这使得相关研究的学术性大为降低。面对民办高教研究的现状,其相关理论的构建和学术表达有必要先从微观层面入手,自下而上逐步推进。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质性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是产生理论的重要途径,值得研究者去关注。质性研究在民办高教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在于相关理论构建的诉求,还在于它对于研究对象的澄明、理解、对话的价值。诚如学

者李培林所言:“从生活到话语已经存在一层‘遮蔽’,从话语到文本的产生,又产生了一层‘遮蔽’,……相对于统计分析的强有力工具,口述史和个案深描的永恒魅力,就在于它的‘去蔽’能力。”<sup>[5]</sup>实际上,前文所述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研究者们缺乏运用“底层叙事”对教育场域“去蔽”的意愿和能力。没有“底层叙事”的支撑,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理解只能悬浮在假定的观念和不研究自明的常识观之上,至于更高层面的相关中层理论、一般理论乃至宏观理论的构建都成了问题。没有了相应的理论支持,量化研究中的假设便失去了理论依据。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学术表达中“形式上民办性质的宣称”只不过是一般性的教育问题,并没有多少学术上的特殊意义。当然,这个方面不是民办高等教育研究者独有的学术困境,也是整个教育学学界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民办高校自身而言,“底层叙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转变研究者“伪求异思维”的研究倾向,提升其学术水平,还在于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能够比较有效地揭示院校层面的种种问题,有利于学校教育的改进和发展。至于研究者的主体色彩,若是能够恰当地运用“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关系,处理好“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境遇,也能将各自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从而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效。这方面,在具体的研究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在院校层面上,尝试运用“底层叙事”的方式做了一些研究,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本人就职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主管学校各级各类教育教学课题的申请、结题工作,年终也参与教研论文的认定,且与部分公办高校的教育研究机构有联系,因而有机会审视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方面面。文中与此等表述相关的论断,基本上是本人的切身体会(当然不是“伪求异思维”的结果),有些则是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M].曲囡囡,刘明堂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2]张春兴.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42.

[3][4][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

[5]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

(责任编辑:徐治中;责任校对:于翔)